

十九世纪 中国的鼠疫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美]班凯乐 / 著

朱慧颖 / 译

余新忠 / 校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十九世纪 中国的鼠疫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美] 班凯乐 / 著

朱慧颖 / 译

余新忠 /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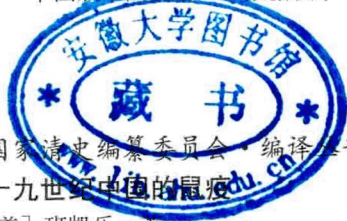
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 / (美) 班凯乐著; 朱慧颖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4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7-300-21030-8

I. ①十… II. ①班…②朱… III. ①瘟疫-中国-19 世纪 IV. ①R254.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5695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

[美] 班凯乐 著

朱慧颖 译

余新忠 校

Shijiu Shiji Zhongguo de Shuy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7.7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0 000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戴 逸

执行主任 马大正

委 员 卜 键 朱诚如 成崇德 郭成康

潘振平 徐兆仁 邹爱莲

学术秘书 赫晓琳 李 岚

编译丛刊编委会

主 编 于 沛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美]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巴斯蒂夫人

[德]达素彬 [俄]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刘 东 张西平

[英]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 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

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曾和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而来，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的历

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沛

2004年5月

致 谢

我要感谢许多老师、同事、朋友和家人，他们倾力助我完成了本书。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哈罗德·卡恩（Harold Kahn）和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治学严谨、天资过人、对人體贴，他们不仅在本研究的不同阶段热情地支持、鼓励我，而且一直启发我，给我灵感。我也感谢安·珍妮特（Ann Janetta）、席文（Nathan Sivin）和韩书瑞（Susan Naquin）全面深入地点评本书，虽然我无法悉数采纳他们的修改意见，但本书无疑因为他们而更丰富。

我有幸获得了许多机构的资助：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为我在中國开展研究提供了补助；贾尔斯·怀丁夫人基金会（the Mrs. Giles Whiting Foundation）的奖学金使我得以安心撰写博士论文；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蒋经国基金会（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和威廉姆斯学院 (Williams College) 资助我进行专题研究, 期间我对原稿做了最后的修改与准备; 乔治城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则为地图的准备工作提供了补贴。对于上述机构, 在此谨表谢忱。

在中国卫生部、北京中医药大学, 尤其是指导老师甄志亚教授的帮助下, 我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那一年不仅令人愉快, 而且卓有成效。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华医学会云南分会的田敬国医生。此外, 我也要向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编目、借阅部门的工作人员致谢。本书得以完成, 也离不开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东亚藏书馆 (the East Asian Collection of the Lou Henry Hoover Library)、国会图书馆东亚部 (the East Asian Division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员工和威廉姆斯学院索耶图书馆 (Sawyer Library) 馆际互借部门员工的帮助。

还有许多朋友和同事为本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顾德曼 (Bryna Goodman)、罗友枝 (Evelyn Rawski)、韩嵩 (Marta Hanson) 认真阅读了本书的最初几稿, 提出了许多深刻、有见地、有助益的改进意见。李中清 (James Lee) 和张嘉凤大方地让我阅读他们的未刊稿。用不同方式帮助过我的人还有: 乔治·格雷恩 (George T. Grane)、尼尔·戴蒙特 (Neil Diamant)、彼得·弗罗斯特 (Peter Frost)、费侠莉 (Charlotte Furth)、保罗·霍华德 (Paul Howard)、饭岛涉 (Iijima Wataru)、康豹 (Paul Katz)、汤姆·科赫 (Tom Kohut)、诺曼·库彻 (Norman Kutchner)、梁其姿 (Angela Leung)、麦柯丽 (Melissa Macauley)、乔伊思·马登西 (Joyce Madancy)、曼素恩 (Susan Mann)、米华健 (James Millward)、约翰·谢帕德 (John Shepard)、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凯文·王 (Kevin Scott Wong)。我还要特别感谢陈驰坤 (音译)、岳明葆 (音译) 和亚当·周 (Adam Chau) 为我翻译

部分资料，艾米·格拉斯金（Amy Klatzkin）巧妙地指导我完成论文的编辑与出版，维多利亚·司各特（Victoria Scott）认真细致地审阅论文终稿。

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是母亲穆丽尔（Muriel Benedict）和父亲詹姆士（James Benedict）。对于北京的一些朋友，如林强（音译）、陆宇明（音译）、王俊（音译），我的感激难以言表。帕勒·亨克尔（Palle Henckel）为我带来了好心情，也在电脑问题上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建议。米歇尔·沃恩（Michelle Vaughn）和尼尔斯·柯罗（Niels Crone）陪我度过了本研究的最后阶段和新研究的起步阶段。我还要向威廉姆斯学院历史系和亚洲研究项目的同事致谢，谢谢他们的无间合作和作为学者型教师设立的高标准。在周五下午的会议上，凯西·约翰逊（Cathy Johnson）、艾莉森·凯斯（Alison Case）、斯嘉丽·江（Scarlett Jang）不仅提出批评，也带来友谊。最后，保罗·埃辛（Paul Ashin）——无论多久多远，他总是会提出批评和建议，阅读我的一份又一份文稿，我要向他致以最深的谢意。

缩略词

我在正文和注释中使用了下列缩略词。此处未列举的著作，在正文与注释中标明了作者与时间。关于这些著作，详见参考文献。

- | | |
|---------|--|
| 《宫中档》I | 宫中档，朱批奏折，文教类，医药卫生。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 |
| 《宫中档》II | 宫中档，朱批奏折，内政类，赈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 |
| NA | 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卷宗与缩微胶卷说明如下：
PHS, RG 90 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Service），档案组合 90（Record Group 90——相当于全宗，译者注），中央文件（Central |

File), 1900。

USDS, RG 59 国务院 (Department of State), 档案组合 59, 国务院一般档案 (General Records), Decimal File, 1910—1929。

M100 美国驻厦门领事馆函件, 1844—
1906, 缩微胶卷 100。

M101 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函件, 1790—
1906, 缩微胶卷 101。

M105 美国驻福州领事馆函件, 1897—
1901, 缩微胶卷 105。

M108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函件, 1844—
1906, 缩微胶卷 108。

NCH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1894, 1911。

《鼠疫流行史》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中国鼠疫流行史》, 2 册, 北京, 1982。

目 录

导言	1
鼠疫的传染病学	4
当代中国的鼠疫生态学	5
清以前中国的鼠疫记载	8
第一章 中国西南地区鼠疫的起源 (1772—1898)	17
18 世纪的瘟疫 (1772—1830)	18
19 世纪的瘟疫 (1854—1898)	38
结论	50
第二章 鼠疫的地区间传播 (1860—1894)	52
云南—岭南鸦片贸易的发展	54
19 世纪中期西江沿线的干扰和北海的崛起	59
鼠疫从云南到岭南的扩散	64
鼠疫从北海到广东中部和东部的传播	69

结论	76
第三章 东南沿海鼠疫的空间传播 (1884—1949)	77
概念与争议	79
东南沿海鼠疫的传播	86
结论	102
第四章 19 世纪中国对鼠疫的医学、宗教和	
行政反应	105
中国传统医学对鼠疫的解释	106
关于鼠疫起源的民间信仰	115
社区对鼠疫的应对	119
官方对鼠疫的应对	126
结论	134
第五章 市民行动主义、殖民医学与 1894 年广州、	
香港的鼠疫	137
广州的市民行动主义：善堂对鼠疫的应对	138
香港市民行动主义与国家医学的冲突	143
结论	156
第六章 鼠疫与新政时期中国国家医学的起源	
(1901—1911)	158
鼠疫、船舶检疫和主权问题	160
袁世凯与警察指导的公共卫生	162
新式警察与鼠疫控制工作 (1910—1911)	164
结论	172
结论	174
附录 台湾 (1897—1917)、香港 (1893—1923) 鼠疫	
发病率与死亡率模式	181
附录 A 香港 (1894—1923)、台湾 (1897—1917) 的鼠疫	
发病率与死亡率	183

附录 B 香港 (1893—1907)、台湾 (1897—1906) 的 人口死因比较·····	188
参考文献 ·····	196

导 言

在有文字可考的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腺鼠疫的大范围流行。第一次是查士丁尼鼠疫 (the plague of Justinian)，公元 6 世纪它席卷了中东和地中海地区 (Dols 1977: 14-19; Hirst 1953: 10)。第二次是 14 世纪的“黑死病” (Black Death)。此次鼠疫始于 1347 年，先从西亚蔓延到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又波及西班牙和法国，最后到达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波兰 (Benedictow 1992; Dols 1977; Shrewsbury 1970; Ziegler 1969)。第三次大流行出现于 19 世纪末，在地理范围上大大超过了前两次。1894 年，广州和香港出现了腺鼠疫，数年内从香港传遍了亚洲的许多地方：1896 年传到了印度，1898 年到越南，1899 年又传入日本 (Hirst 1953: 104; Janetta 1987: 194; Velimirovic 1972: 493)。截至 1900 年，国际航运业已将鼠疫从亚洲带到了遥远的国际港口，如旧金山和格拉斯哥，造成了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 (Hirst 1953: 296-303)。

近代此次大范围流行的鼠疫发源于中国西南地区。18 世纪晚期云南省暴发了腺鼠疫。最早记录的有可能是鼠疫的疫病出现于